

韩立群 著



# 沈从文论

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天津人民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名著丛书

韩立群 著

# 沈从文论

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00465774\*

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藏

登录号 00859218

书号

I206.6

H87 4

天津人民出版社

(津)新登字001号

**沈从文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

韩立群 著

\*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河北省抚宁县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13印张 320千字

1994年9月第1版 1994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ISBN 7-201-01955-4/I·76

定 价: 9.80元

## 引 言

这本书并无新奇观念和宏大理论体系建构,只是五年来研读沈从文创作体会的记录。名为“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含有两重意义。一是对于沈从文思想艺术个性的概括。即在我眼中的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者和批判者,他是从民族文化史的宏观视角审视和感悟人生并思考探究民族前途命运的,对于中国现代文化的深刻反思,是他思想创作内涵博大精深之处。二是对于沈从文文化环境的概括。我认为沈从文沉浮多舛的曲折遭遇典型地反映了“左”倾路线在现代文化史上的影响和危害,这曾支配和决定一代作家命运的文化历史所包含的教训,值得研究者和文化工作者认真反省和思考。这两点认识,也便是我研读沈从文创作的结论。但限于时间和精力,在书中写出并加以论证的却只是前一内容。

沈从文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个性独异,成就卓著,早在三十年代就蜚声中外文坛的著名作家。但由于历史的偶然和必然,于四十年代未过早搁笔,以至长期为历史所弃,为读者所遗忘。直至八十年代才像“出土文物”被重新发掘和认识。因此,沈从文虽成名很早,但真正被作为著名作家从正面研究和认识,却是近几年的事。历史证明沈从文是具有强大艺术生命力的作家,批评家和文学史家尽管对他认识分歧悬异,褒贬不一,但对他的历史影响却都并未抹杀。三十年代以后的文学史记录了

沈从文历史价值地位的沉浮，也反映了人们对他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大致分为四个阶段。

三十年代是沈从文作品的批评阶段。这时他的创作已进入成熟时期。从1931年至1938年间，写作并出版了二十多个小说、散文和文论集，代表性作品，如中篇小说《边城》，长篇小说《长河》（第1卷），短篇小说集《虎雏》、《如蕤集》、《八骏图》、《新与旧》，散文《从文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都产生于这一时期。这些创作不但数量可观，而且以题材风格的新颖和艺术趣味的独特为文坛注目，得到权威作家和批评家的高度评价。最有代表性影响较大的批评文章是苏雪林的《沈从文论》（《文学》1934年9月1日第3卷第3期）和刘西渭的《〈边城〉与〈八骏图〉》（《文学季刊》1935年9月6日第2卷第3期）。这两篇文章准确地把握了沈从文的艺术个性，体现了历史与审美相统一的批评标准，较好地运用了比较方法。这是国内迄今为止，对沈从文评价得当、观点方法比较科学的经典性文论，代表着三十年代文坛对于沈从文的认识和文学批评水平，已作为重要史料编入《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理论集》。刘西渭先生是著名印象主义批评家，他对沈从文艺术个性总体特征的描绘堪称一绝。他从艺术风格和审美性质的独特性上评论沈从文，将他推上世界小说家行列。他认为在世界小说家中从审美性质来区分，可分为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小说家的小说家”和以福楼拜为代表的“艺术家的小说家”两类，就审美而论，前者是“天真的”，后者是“自觉的”，而沈从文属于后者。他以“热情的”、“诗的”、“美”而“合乎自然”和“爱”而“悲哀”等特征来描绘沈从文小说的抒情性，并与其他中外抒情小说家加以比较。他说：“有些人的作品叫我们看，想，了解，然而沈从文先生一类的小说，是叫我们感觉，想，回味；想是不可避免的步骤。废名的小说似乎可以归入后者，然而他根本上就和沈从文先生不一样。废名先生仿佛是一个修士，一切是

向内的，他追求一种超脱的意境，意境的本身，一种交织在文字上的思维者的美化的境界，而不是美丽自身。沈从文先生不是一个修士。他热情地崇拜美。在他艺术的制作里，他表现一段具体的生命，而这生命是美化了的，经过他的热情再现的。”又说：“司汤达是一个热情的人，然而他的智慧（狡猾）知道撒谎，甚至于取笑自己。桑乔治是一个热情人，然而博爱为怀，不唯抒情，而且说教。沈从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边城》是一首诗，是二佬唱给翠翠的情歌。《八骏图》是一首绝句，犹如那女教员留在沙滩上神秘的绝句。”他称《边城》是一部杰作，“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在艺术上达到“一切准乎自然”的境界，“细致，然而绝不琐碎；真实，然而绝不教训；风韵，然而绝不弄姿；美丽，然而绝不做作”。他认为沈从文的艺术自觉集中表现为对美与爱的敏感与抽象追寻，“他能够把丑恶的材料提炼成功一篇无暇的玉石”，“可以从乱石堆发现可能的美丽”；“他所有的人物全可爱”，“各自有一个厚道而简单的灵魂”，质朴中透着“悲哀”；美与爱的内涵使“他的小说具有一种特殊的空气，现今中国任何作家所缺乏的一种舒适的呼吸”。苏雪林从深刻的哲学文化内涵和艺术风格的独创性两方面肯定沈从文在文坛上的地位。她富有真知灼见，第一次揭示了沈从文审视现实的文化视角及其所包含的民族功利主义动机，这便是“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二十世纪舞台上与别个民族争生存权利”。她更肯定沈从文艺术风格的特殊和驾驭文字的惊人功力，称他是“在鲁迅，茅盾，叶绍钧等系统之外另成一派”，在文字技巧方面“好象吕纯阳的指头，触到山石都成黄金，好象神话里的魔杖能够将平常境界幻化为缥缈仙国”。

四十年代是对沈从文的政治批判阶段。他这时已成为久负盛名的著名教授、作家，同时主持四个大报（《大公报》、《益世

报》、《经世报》、《平明日报》)文学副刊的编辑,是文学界举足轻重影响广大的青年导师和思想领袖之一,五十年代成为文坛中坚的一批作家中有许多是这一时期在他影响和指导下培养起来的。他继续“五四”启蒙主义者的文学主张,在民族救亡时代力图复兴文学运动,“重造经典”,要求作家不要满足于一般抗战通俗宣传,而要履行作家特殊的使命,着眼未来,深入把握抗战时期民族精神的现实,为“国家重造”,写出可以教育第一流政治家的“民族百年立国的经典”。为倡导和实践上述思想,他先后发表了《一般或特殊》(《今日评论》1939年第1卷第4期)、《文学运动的重造》(《文艺先锋》1942年10月25日第1卷第2期)、《从现实学习》(《大公报》1946年11月3日、10日)等文章。他的主张孤立看来是深刻而宏大的,但在那全民救亡时代是不可能实现的,并且由于过分强调文学运动的纯洁性、文学内容的经典性和作家工作的特殊性,而在表述中与处于主流地位的抗战文艺运动及“文协”所倡导的“作家从政”、“文章入伍”的主张有相悖之处。因此,他的观点便被概括为“反对作家从政论”与朱光潜、梁实秋同时作为抗战时期反动文学思潮加以批判。他的被批判从主观上看是他本人失于不识时务;从客观上看则是“左”倾教条主义在文艺界的表现。这纯然的政治批判,历时长达八年之久,上纲越来越高,最后这曾经蜚声中外文坛的著名作家却被界定为“地主阶级的弄臣”、“一直有意识的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的“反动作家”和政治上“第三条路线”“第四组织”的代表(《斥反动文艺》;《大众文艺丛刊》第1辑),其文学创作也被斥为“桃红色文艺”打入冷宫。

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是沈从文被历史和读者遗忘的阶段。四十年代的批判从政治上剥夺了他作家的权力,所以,1949年9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与会代表名单上并无他的名字,于1950年他结束了作家生涯而改做博物馆工作。1953年开

明书店销毁了他的已印、未印的书稿及纸型，此后沈从文的名字及其作品便在文坛上消失，渐为读者所遗忘。这时期出版的文学史记载有对他的批判，至于他的创作则很少提及，即是提及也都采取批判态度。

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是沈从文研究阶段。随着“四人帮”垮台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意识形态领域开始清除与摆脱“左”倾路线影响，遵循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原则，对历史及历史人物重新反思和认识。长期被遗忘的沈从文便从此被挖掘出来，并且他的作品很快与广大读者产生强烈共鸣，形成八十年代的“沈从文热”。沈从文被重新认识与“沈从文热”的形成，还有世界文化背景，这便是伴随改革开放政策而来的国外和港澳地区沈从文研究的直接影响。正是由于这些系统的学术水平较高的研究成果的介绍和影响，才使对沈从文的认识从一般文学批评和政治批判阶段进入科学的历史研究阶段。

沈从文研究在美国开始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已有较多成果。有影响的研究者是夏志清、叶维廉、麦克唐纳、聂华苓和金介甫等。其中夏志清研究最早，后起的金介甫成果最突出影响也最大。夏志清在他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用一整章篇幅论沈从文，对沈从文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出极高评价，说“他是现代中国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在艺术造诣上，“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叶维廉、聂华苓和麦克唐纳也都有研究沈从文的著作出版，只是没有前者影响大。金介甫在1977年以论文《沈从文笔下的中国》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1987年后又出版评传《沈从文的奥德赛历程》(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中译为《沈从文传》。这位迄今为止真正称得上沈从文研究专家的外国学者，也是沈从文的崇拜者。他在博士论文中把鲁迅和沈从文比作功绩并列的作家，在传记《引言》中又把沈从文归入世界大作家之列，认为他虽不能与莎士比亚、

巴尔扎克、乔伊斯齐名，却可以超过都德和弗朗斯，他的杰作可以和契诃夫的名著媲美。他预言：“非西方国家的评论家包括中国的在内，总有一天会对沈从文作出公正评价：把沈从文、福楼拜、斯特恩、普罗斯特看成成就相等的作家。”1982年，在钟开莱教授倡议下，金介甫邀集夏志清、许芥昱和德国的马汉茂等国外学者联合向瑞典科学院推荐沈从文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香港的沈从文研究在七十年代已有较高水平。著名现代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在1975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史》（上、中、下三册）和《新文学丛谈》两本专著中都把沈从文列入现代文学史上小说和散文大家行列，并对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沈从文的成果及研究者的观点作了系统评介。上述学者研究专著的出版首先在海外产生广泛影响，引起世界许多国家学术界对沈从文的注意和研究兴趣，形成世界范围的“沈从文热”。其标志是沈从文的作品在许多国家被大量翻译出版（如四十年代由金陵和英国白英合译的沈从文作品集《中国土地》于1980年在美国重印；由松枝茂夫翻译的《边城》〔日译〕在日本出版；由姚克译的《从文自传》在英美风行；德国有吴乐素译《边城》与沈从文其他小说出版；斯德哥尔摩大学马悦然教授将沈从文作品译成瑞典文等）；有关沈从文的传记、评传和研究专著相继问世；美国、日本、法国、德国等许多国家的中国文学和沈从文研究者纷纷来中国访问；美国学术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于1980年邀请沈从文去美讲学。上述世界性的“沈从文热”对开放的大陆文化界迅速产生了影响，成为八十年代全国范围“沈从文热”产生与发展的直接导因和文化背景。

全国性的“沈从文热”是从1980年开始的。在这一年，长期成为“禁区”而被遗忘的沈从文突然成为文坛最注目的人物。《新文学史料》重发了《从文自传》和作者新加的《附记》，南方几省的文学刊物（如《花城》、《钟山》等），集中发表了一批与“左”倾观点

不同的文章,如金介甫的《沈从文论》(《钟山》1980年第4期)、《给沈从文的一封信》(《花城》1980年第5辑)、朱光潜的《从沈从文的人格看他的艺术风格》(《花城》1980年第5辑)、黄永玉的《太阳下的风景——我与沈从文》等。上述文章的发表直接引起沈从文研究领域思想观点的对立,使一部分研究者在这些文章观点的影响下重新反思近40年来对沈从文的曲解与误解,批判“左”倾观念,试图重新评价沈从文思想和创作。自1981年至1984年引人注目的便是这类对“左”的传统观点进行批评和反思的文章,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吴立昌的《沈从文的“浮沉”与现代文学的研究》(《复旦学报》1981年第2期)和飞舟的《从“反差不多”看沈从文的文艺观》(《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1期)等。同时随着沈从文文集和选集的出版,对沈从文作品的重新批评也已开始。这类文章数量不少,对作品评价也与前不同,但在文学观念和研究方法方面却依然未完全突破传统定势。并且有部分人还恪守“左”的错误观点继续否定沈从文的作品(如《洞庭湖》1984年关于批评《雨后》《柏子》《丈夫》等小说的文章和“座谈讨论纪要”)。因此,1984年前的五年从总体上看还属于意识形态的拨乱反正,对传统观点的批判与反思为沈从文研究开辟了道路,创造了条件,但系统的科学研究却开始于1985年以后,其初期成果是凌宇的研究专著《从边城走向世界》(1985年12月三联书店出版)和在国内重要报刊上发表的近百篇研究论文。1988年沈从文逝世后,沈从文研究达到高峰期。《新文学史料》在1988年第4期开辟《怀念沈从文》专栏,《吉首大学学报》从1989年至1992年连续出三期《沈从文研究专号》,1988年吉首大学发起举行全国“首届沈从文研究学术座谈会”并编辑出版研究文集《长河不尽流——怀念沈从文先生》。这个时期尽管系统专著出版的只有两本《沈从文传》(凌宇的《沈从文传》和金介甫的《沈从文传》中译本),但研究论文不但数量多,所涉内

容广泛,而且学术性强。以全新的价值观念,运用比较方法,从宏观的文化角度,对沈从文艺术个性作综合研究,是这些论文的基本倾向。

我的沈从文研究是在1988年以后开始的,所选取的文化角度,正反映了这一时期研究者的普遍倾向。但在研究中却恪守实事求是的原则,力戒人云亦云,致力于自己的发现。只是到动笔写作时才深感知识与理论水平的不足。因此,不敢奢望这本书在理论上的意义,而只希求我的发现能引起读者共鸣和研究者思考。这本书是我兼任系主任期间完成的两部专著之一。在担负繁重行政工作的情况下能出成果,全靠爱人单力沅支持。当这部书稿写成时,她的健康却受到严重损害。因此,这本书另外的价值则是我们情感与心血的结晶。

本书出版蒙姜启教授和天津人民出版社热情相助,谨致谢忱。

作者 1993年12月30日

# 目 录

|                    |         |
|--------------------|---------|
| 引 言                | ( 1 )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者     | ( 1 )   |
| 一、人生感悟的路           | ( 3 )   |
| 二、文化世界的艺术再现者       | ( 22 )  |
| 三、爱与美的生命哲学         | ( 36 )  |
| 第二章 文化裂变期的焦躁与深思    | ( 49 )  |
| 一、湘西乡土小说综论         | ( 49 )  |
| 二、勇敢雄强素朴踏实的湘西性格    | ( 75 )  |
| 三、童心型的湘西自然女性       | ( 86 )  |
| 四、湘西小说中自然美的建构      | ( 99 )  |
| 五、湘西小说与现代乡土文学的比较   | ( 124 ) |
| 六、湘西小说与艾芜边地小说比较    | ( 143 ) |
| 第三章 都市文化的批判        | ( 157 ) |
| 一、都市文化批判小说综论       | ( 157 ) |
| 二、都市文化世界两种对立的 生命形式 | ( 174 ) |
| 第四章 童心映照的军人世界      | ( 189 ) |
| 一、军旅人生小说综论         | ( 189 ) |
| 二、从军旅小说看作者的兵匪观     | ( 206 ) |
| 第五章 生命哲学的寓言        | ( 230 ) |
| 一、佛经故事新编：《月下小景》    | ( 230 ) |
| 二、生命意识与两性关系        | ( 252 ) |
| 第六章 悲天悯人的乡土抒情诗     | ( 270 ) |

|                          |       |
|--------------------------|-------|
| 一、风格独异的美文 .....          | (271) |
| 二、具有开拓意义的记实性回忆散文 .....   | (279) |
| 三、奇趣横生的传记散文 .....        | (290) |
| 四、现代游记散文的杰作 .....        | (300) |
| 第七章 艺术美的刻意追求与创造 .....    | (308) |
| 一、小说文体的创造：文化散体小说 .....   | (308) |
| 二、《猎人手记》的影响：田园牧歌化 .....  | (322) |
| 三、打破章法的小说结构 .....        | (343) |
| 四、心理描写的深化、外化和虚化 .....    | (356) |
| 五、轻天才灵感重学习体验的作家修养论 ..... | (370) |
| 六、隐蔽的思想倾向性 .....         | (386) |

## 第一章 中国现代文化的反思者

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文化形态和与其相应的两类文化启蒙教育。这便是传统的封建文化及以其为内容的封建文化的启蒙教育和外来的新文化及以其为内容的新文化启蒙教育。中国近现代知识分子的成长道路，也就是以不同的途径接受上述两类文化启蒙的过程。接受启蒙的途径大致有二：一是理性启蒙的途径。这是近现代大多数知识分子成长的基本途径，以鲁迅、郭沫若为最典型。他们从塾师、学堂到海外留学，由“子曰诗云”至“声光电化”，从书本上系统接受了传统和外来文化的启蒙，然后又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伟大启蒙者。二是人生体验的途径，即不是主要通过学校从书本上理性地接受文化启蒙，而是以人生为课堂，从人事观察和生活体验中感悟文化的真谛，从而达到文化启蒙的目的。以此为途径发展的人，为数较少，唯沈从文是这一途径的代表者。这两种文化启蒙途径，形成近现代知识分子两类文化心态：重先验重理性的心态和重经验重感性的心态。沈从文的文化心态，显然属于后者。他写于1932年的《从文自传》是他童年时代人生体验的真实记录，其主旨在于以亲身经历证明人生体验是一个乡土作家的必经之路。他把学校的理性启蒙教育比作读“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将人生体验视为读“用人事写成的大学”，认为一个乡土作家的正确选择是“不必看这本弄虚作伪千篇一律用文字写成的小书，却应当去读

那本色香俱备内容充实用人事写成的大书”(《从文自传》)。这些话正是针对“五四”以来作家囿于书本知识轻视人生体验的普遍倾向讲的。“五四”以后新文化思潮此起彼伏,每个思潮都来自外来文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追赶潮流的作家,其思想和创作风格倾向大都可以索隐方法找到其外来文化影响的源头。故许多作家往往被研究者冠以外国作家的名字,以表示其派属。如“中国的歌德”,“中国的泰纳”,“中国的安那其”等。沈从文的思想 and 创作倾向则只能从他人生体验中去取证。他说:“我虽然已经好象一个读书人了,可是事实上一切精神却更近于一个兵士,到他们身边时,我们谈到的问题,实在就比我到一个学生身边时可谈的更多。……他们那点感想,那点希望,也大多数同我一样,皆从实生活取证来的。可是若同一个大学教授谈话,他除了说说书本上学来的那套心得以外,就是说从报纸上得来的他那一份额感想,对于一个人生命的构成,总似乎短少一点什么似的。”(《从文自传》)沈从文这种从人生体验中感悟人生形成的规律性认识和从生活事实取证的方法鉴别文化思想的学术品格,不仅成为他与“五四”以来多数作家的差异,而且是他超越中国新文化思潮从而对它进行反思和批判的内在原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历史是一个在外来文化直接影响下民族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以“五四”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的深刻历史意义是以外来的科学民主的现代化文化思想对封建传统文化思想进行了彻底批判与反思。鲁迅是这时出现的中国传统文化最深刻的批判者与反思者。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政治形态的限制,“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并未能形成全国统一的新文化,而是出现了以城乡文化对立格局为特征的文化裂变期。沈从文便是这个时期产生的现代半封建半殖民地文化最深刻的批判者与反思者。若将这两位文化批判者、反思者加以比较,则可看到其不同不仅在于反思和批判的对象(一是传统文化,一是现代城市文化),而主要在于反思批

判的视角和参照系。鲁迅的视角虽也包括文化的宏观角度，但主要是道德和政治的，其参照系是以科学民主精神为内容的现代文化思想体系；沈从文则完全是文化的视角，其参照系是来自人生体验的人生感悟。

## 一、人生感悟的路

一个乡土作家的生命之根总是深扎在他出生的乡土里，也就是将自己的生命同乡土的自然世界与人生世界同化。二十岁以前的沈从文所经历的人生历程，就正是这生命与乡土同化的过程。

沈从文出生于行伍家庭，从小聪明好动，从四岁起在家跟母亲认字，六岁进私塾读书。单调偏狭的私塾生活一开始就使他产生出无法忍受的压抑感与憎恶感。他视私塾为囹圄而很快从顽皮孩子那里学会了各种聪明的逃学办法，骗过顽固塾师，终于使一颗童心飞向广阔丰富新鲜生动的自然世界。从《从文自传》可以看到，六岁至十二岁是沈从文私塾启蒙教育时期，但他这时所获取的知识，增长的智慧，却不来自塾师和书本，而是来自生动的自然世界和人生世界。这是他的生命与自然乡土世界同化的极其关键的时期。正是这个时期的活动形成他一生“性格与感情的基础”。

从人的个体生命发展历史来看，人对于客观世界的接触与了解，都是首先从自然领域开始而后进入社会领域的。因此，童年时代的世界主要是自然世界。正是在这里表现了人与自然的契合，亦即主体生命与自然世界的同化。这个特点在每个作家特别是乡土文学作家的经验中都有表现，但以沈从文为最突出和典型。在沈从文的童年时期，生命与乡土自然世界的同化，主要

不是表现在他对生存的自然环境和自然风物烂熟于心，掌握了关于它们的最丰富生动的知识和资料，而是主要指他的生命由于一颗爱自然充满幻想与猎奇意识的童心，在同自然的接触中达到了彼此契合的程度。这种契合突出表现在两点上：其一是以感官为契机将独特生动的乡土自然世界转化为主体生命的感觉和由这感觉而生的爱的情感。《从文自传》中曾记录了大量的这类事实。他认为要将客观自然世界转化为主体生命的感觉与情感，仅靠常人惯用的视觉是远远不够的，而必须调动听、嗅、触觉和思索记忆等所有生命的器官来捕捉、感受和记印自然大千世界的“光影形线”和色嗅味美。由于他在一颗童心支配下“各处去看，各处去听，还各处去嗅闻”，所以“死蛇的气味，腐草的气味，屠户身上的气味，烧碗处土窑被雨以后放出的气味”以及“蝙蝠的声音，一只黄牛当屠户把刀划进它喉中时叹息的声音，藏在田埂土穴中大黄喉蛇的鸣声，黑暗中鱼在水面拨刺的微声”等，他不仅能分辨出它们的种类和分量的不同，而且将它们化为感觉和爱的情感，作为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深深保留在记忆神经构成的映幕上。自然世界既经转化为主体生命的一部分，就具有了主观的、情绪的和幻想的色彩；正是这一因素才使对童年时代乡土自然世界的回忆，成为乡土作家共同的永恒主题。如鲁迅的《故乡》、《社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都是这方面的成例。其二通过审美的契机以自然世界美的品格陶冶主体生命的性格。“水”是湘西自然世界的主体形象。湘西古称“地有五溪”，其中主干沅江，纵横几千里，其主流和辰水、酉水、武水等支流，均流贯沈从文家乡。水是湘西自然世界万物生机的源泉，也是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命脉。湘西人自古靠两种职业生存：约一半人在江中航运，“吃水上饭”；另一半人则在江边“地面上生根”，得水之利种植桔柚，“将肉体生命寄托在田园生产上”。湘西乡土独特的自然美，正是水和由水而生的桔柚构成的。作者在《长河》中曾